



# 馬連柯敎育論文選

(一)

譯浪天·光石著柯連卡馬

中 生 外 版 社

#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一)

A. С. МАКАРЕНКО

Избранные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Раздел первы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ЛЕКЦИЙ, ДОКЛАДОВ  
и ВЫСТУПЛЕНИЙ

译者 石光·天渡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译本出版者

## 中外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電話：（二）〇六七九

原書刊期 1949

译本刊期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 有 版 權 ★

京初(0001—8000)

## 出版者的話

我們從馬卡連柯選集第四卷中譯出三篇，第三篇內容尤為豐富，又分兩篇。我們為使讀者閱讀與購買便利起見，特分成四冊出版。

第一冊包括馬卡連柯對師範學院的學生、教師、科學的和指導的啟發工作者們講演的講義，報告和講話的紀錄，其中有『我的教學經驗中的幾個結論』，『我的教學觀點』二篇，是闡述他從蘇維埃人民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教學經驗中得出來的基本思想和理論上的教育結論。

第二冊論文中包括『教育家們在聳肩了』，『教育的目的』，『蘇維埃學校中的教育問題』，『學校中性格的培養』，『對家長們的談話』，這是馬卡連柯在報紙上發表的許多教育專題的論文。

第三冊爲『三〇年的進行曲』，是記述馬卡連柯教育學說的實驗場所——  
捷爾仁斯基公社的生活與活動。

第四冊，『○一——一』，也是記述捷爾仁斯基公社的生活與活動。  
關於馬卡連柯選集第一、二、三卷現正翻譯和整理中。

一九五一年五月

編者序言

這一部 A · C · 馬赤連柯『教育學論文』文集的編纂，第一篇是馬赤連柯對師範學院的學生、教師、科學的和指導的啓蒙工作者們講演的講義、報告和講話的記錄，闡述他從蘇維埃人民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教學經驗中得出來的基本思想和理論上的結論。這一篇所包括的是馬赤連柯於一九三八年一月給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編輯部所講的以『學校的蘇維埃教養的問題』為題目的五部分講義，馬赤連柯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州教師會議上所作的以『我的教學經驗中的幾個結論』為題目的報告，以及他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在哈爾科夫師範學院科學工作者、教師與學生聯席會上所作的以『我的教學觀點』為題目的報告。

文集的第二篇，是搜集馬赤連柯在世時及逝世後在『真理報』、『消息報』、『教師報』、『文學報』等報紙上所發表的許多教育專題的論文而編成的。

在這些論文中：「教育家們在聳肩了」，「教養的目的」，「蘇維埃學校中的教養問題」，「學校中性格的培養」，「和家長們的談話」等等。

文集的第三篇，是搜集馬赤連柯藝術教育的論文而編成的。在這一篇裏，包括有「三〇年的進行曲」——這本書最初於一九三二年刊印了一次後，即未再版而成了圖書館的珍本；包括有馬赤連柯未發表的手稿——「ФД——」他在一九三二年記述捷爾仁斯基公社的生活與活動，以及包括有『教育詩篇』裏個別的零星作品：『我們質疑的願望』，『家庭教師』，『教育團體的長久性』，『順着教育的崎嶇之路』和『進化』及『爆發』。

在每一篇裏（除『教育詩篇』中的零星作品外），文集的材料是按照年代的先後排列的。

馬赤連柯在這文集的作品裏，對於共產主義兒童教養方法的基本問題，用理論的形式闡述他自己的教育觀點。讀者對於以下這樣的蘇維埃教育學的問題，無論在理論的方面或在實際教育的方面，在這裏會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和自己感到興味的東西，這些問題譬如：教育和政治的聯繫，和社會主義社會政治任務的聯繫，關於蘇維埃教育科學的積

極性質，關於教養的指導方針的性質，關於個別教養和集體教養的方法，關於兒童教養中教師集團和兒童集團的作用，兒童教養中遠景的意義，兒童集團中優良傳統的教養，蘇維埃紀律教養的方法，關於蘇維埃學校中唯美的、體育和勞動的教養。『蘇維埃教育

』雜誌的編輯部，曾以這部書編入一九四九年書後的附錄叢刊中。

編輯部對於刊作附錄的本書，期待着讀者們的批評及將來的願望。

## 學校的蘇維埃教養的問題

### 教養的方法

我們要談的是以教養爲主題。同志們，你們得要注意，我是一個實際戰線上的工作者，因而在我說的話裏，當然要有些側重實際。但是我認爲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即這個時代是實際的工作者們把優秀的團體引導到科學的原理中去。在蘇維埃聯盟的我們這些工作者們，就叫做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我們知道，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實際戰線上的工作者，是怎樣地作了許多的修正而貢獻了許多的原理，貢獻了甚至比我們更準確的科學，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在勞動生產率的事業上，在勞動工人和專門技藝的事業上，是怎樣地打破了許多新的紀錄。這種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是單純地增大勞力的支出，而是靠着新的工作態度，新的邏輯，新的勞動要素的配置。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靠着發明、發現和尋求的方法。

我們的生產領域——教養的領域，無論如何也不能被擋除於這種一般的蘇維埃行動之外的。就是在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裏——我對一切的生活都深信這一點——，也必須要發明，甚至在個別的瑣碎事故裏，在細微的事故裏，而尤其在成堆的瑣碎事故裏，在組織裏，在組織的各部分裏，也都需要發明。當然，這樣的發明，不僅是理論戰線上的工作者能夠作到，而且通常的平凡的工作者，就像我這樣人吧，也能夠作到。因此，無妨讓我說一說自己的經驗和這經驗中的結論，我認為經驗的意義也必然是存在於這樣的團體的平凡性中，即這種團體可使實際的工作者獲得理論的定義。

我要和讀者說的話是甚麼呢？

許多人把我認為是一個從事流浪兒童教育工作的專門家。這是不對的。我一共工作了三十二年，其中有十六年是在學校，十六年從事流浪兒童的教育。實在，在學校裏我整個的生活都是在特殊的條件下工作着——在一個工廠附設的學校裏工作着，這個學校是經常地受着工人的公衆性、黨的公衆性所影響的。

同樣地我的流浪兒童的教育工作，也決不是專門的流浪兒童的教育工作。第一，從我從事自己的流浪兒童教育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作為工作的前提而這樣地認定，即對

於流浪兒童的教育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殊的方法；第二，我能夠在很短的時期把流浪兒童的教育引導到標準的狀態中，並把這種工作進一步進行得像正常的兒童教育一樣。

我在哈爾柯夫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管轄的捷爾仁斯基公社裏最後的工作時期，已經有了一個正常的團體，這個團體有十年級的班次，並追求着我們通常的學校所追求的那種通常的目的。在這個團體裏的兒童，都是從前的流浪兒童，實質上和平常的兒童毫無區別。如果真要想區別的話，那麼可以說是站在較好的這一方面吧，因為捷爾仁斯基公社勞動團體中的生活，提供了很多補充教育的影響，甚至勝過家庭。所以我的實際的結論，不僅可以使用於流浪的勞動兒童們，而且也可以使用於一切的兒童團體，因而也可以使用於一切的教養戰線上的工作者們。

這就是首先要指出的，我請讀者們注意。

現在，說一說關於我在實際教學上的邏輯本身的性質。我已經得到了若干的心得，這些心得並不是毫不費事並且也不是很快地得來的，而是經過若干非常困難的躊躇與錯誤的階段的，我已經得到了若干的結論，這些結論在若干讀者看來是奇怪的，但在我說來，關於這些結論，是不怕把它們報告出來而有充分的證明的。這些結論中有一些是具

有理論上的性質。在我開始敘述自己的經驗以前，簡略地把它們列舉出來。

首先一個有趣味的問題，就是關於教育科學本身性質的問題。在我們現代的教育思想家和我們個別的教育工作組織者之中，有一種自信，認為不需要任何的、特殊的、個別的教養工作的方法；教學的方法，科目的教授法，本身就應該包括着一切教養的思想。我是不同意這一點的。我認為教養的領域——純粹教養的領域——在若干情況下，乃是個別的領域，和教學的方法有所不同。

在這一點上特別使我相信的是甚麼呢？使我相信的是以下的所述。在蘇維埃的國家，受教養的不僅是兒童，不僅是小學生，而每一個公民在每一步驟上都需要受教養。受教養這件事，或者用特別組織的方式，或者用廣大的社會影響的方式來實行。在我國，每一件事情，每一種運動，每一個過程，往往都不僅是伴隨着特定的任務，而且也伴隨着教養的任務。不久以前我們所體驗過的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就可以充分證明；在這裏是一個牽涉到數千萬人的龐大的教養工作。我要特別強調紅軍的成功的教養工作：大家知道得很清楚，每一個人參加了紅軍，從那裏就改變為一個新人，不僅具有新的軍事知識，新的政治知識，而且更具有新的性格，新的技術，具有行為上新的典型。這一切都是

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教養工作，在它的作風上，在它的傾向上當然是統一的，並且也當然是以一定的教養方法武裝起來的。蘇維埃政權二十年來所實行的這種方法，是已經可以總結了。而如果再把我們學校、我們高等專門學校、我們其他類型的組織像幼稚園、兒童宮在教養的成就上豐富的經驗補充到這種方法上，則我們就有極大的教養工作的經驗了。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黨、青年團早已審訂的、頒佈的、準確實行了的教養方法的章則、批示、法令，把列寧和斯大林同志的主張都拿來看一看的話，則我們實際上在現在，老實說完全可能製成一部真正的宏富的蘇聯一切教養事業的理論和真詮的法典。

我個人在實際上也必須把教養的目的作為主要的目的，因為在十六年的期間裏，委託給我的是所謂違法者再教育的工作，首先擺在我面前的就是——教養。甚至沒有人在我的面前提出教育的任務。交給我的是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違法的人們，用舊的話說是——犯罪者，這些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都帶有十分明顯的和可怕的特性，而首先擺在我面前的目的是——改造這種特性。

我很快地獲得了一種心得，即在工學團的制度中，學校是強有力的教養的手段。在

最近的幾年，爲了確信學校是教養手段這個原則，我會受到工學園管理處個別工作者方面的壓制。我在最近的十年以來，憑着這完全的十年級制的學校而堅決地相信，真正的再教育，保證不再重犯的完全的再教育，只是在十年級制的中等學校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現在我依然保留着這樣的自信，即教養工作的方法，有它自己的邏輯，比起教育工作的邏輯來是獨立的。以上的兩者——教養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照我的意見，乃構成兩個部門，構成教育科學或多或少的獨立部門。當然，教室裏一切的工作，往往都是教養的工作，但是把教養的工作歸併到教育中，我認爲是不可能的。以後我將更詳細的談到這一問題。

現在可以就教養方法的基礎來說幾句話。

我首先相信，不能從心理學和生物學這樣的科學中，給教養工作的方法作出結論。我相信，我們沒有權利從這些科學中給教養的手段作出直接的結論。這些科學有它在教養工作中的意義，但却不能給結論作前提。

此外，我認爲教養方法的教育手段，只能從經驗中取得（而再以心理學和生物學這樣的科學原理加以驗證和確定）。

我這種主張是從以下的見解出發的：教育學，尤其是教養的教育學，首先是在實際上適合目的的科學。我們若不給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就不能直接去教養人，就沒有權利擴大教養的工作。教養工作若不用確切的、開展的、詳細明白的目的來武裝，就是對政治不關心的教養工作，並且在我們蘇維埃的公衆生活中，我們步步都遇到這種情形的確證。紅軍在教養的工作中，具有巨大的、宏偉的、世界史上獨特的成就。這種成就之所以如此巨大與宏偉，是因為紅軍的教養工作一直到底是適合目的的，紅軍的教養者們永久知道他們要教養誰，他們要達到甚麼。而不適合目的的教育理論，最好的實例便是不久以前廢除了的兒童學。在這種意義上兒童學可以被看做是和蘇維埃教養的目的完全對立的。這乃是教養的工作，而不是漫無目的的工作。

從甚麼地方才能產生出教養工作的目的呢？當然，這個目的是從我們社會的需要、從蘇維埃人民的意向、從我們革命的目標和任務、從我們鬥爭的目標和任務中產生的。就是照這種目的的公式來說，自然也不能從任何生物學或心理學得出結論的，而只有從我們的社會歷史、從我們的社會過程中，才能得出結論。

在這一點上我想，爲了證實教養的方法，一般地來規定生物學和心理學這樣的關係

， 在目前是不可能的。這些科學正在發展着，並且，也許在最近的十年中，無論是心理學或生物學，將會提供出關於人類個性行為準確的原理，而那時候我們將可能更多地去倚賴這些科學。我們社會的需要，我們社會主義教養的社會目的，對於心理學與生物學的目的和已知的理論所發生的關係，必然是永久在改變着，而這種關係，可以說甚至在心理學和生物學經常參加到我們教養工作的這方面，也將要改變。我所堅決相信的是甚麼呢？我相信無論是從心理學中或從生物學中，都不能用演繹的方法、用簡單的三段論法的方法、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得出結論，都不能作出教育手段的結論。我已經說過了，教育手段首先應該從我們社會的和政治的目的中來作結論。

我相信在目的的領域，在適合目的性的領域中，教育理論首先犯了錯誤。在我們教育工作中一切的錯誤，一切的偏向，總是發生於邏輯的、適合目的性的領域中。我們姑且把這個叫做錯誤。

我在教育理論中看出這樣的錯誤有三種形式：演繹臆斷的形式，道德上拜物主義的形式和孤立手段的形式。

我在自己的實踐中，由於和這樣錯誤的鬥爭而感到很多的苦惱。有人採取了某種方

法並肯定說，這種方法的結論就是如此；像這樣的例子，就是你們大家所熟知的綜合教學的掌故。他舉出一種方法——綜合教學的方法；滿心指望從這種方法中用邏輯的推理作出肯定的結論說，這種教學的方法能得出良好的結果。

綜合教學法能得出良好結果的這種結論，是在經驗的驗證以前就肯定了的；而肯定說結果一定會是良好的；在某種心理奧秘的地方，那裏會隱藏着良好的結果。

當樸質的實踐工作者要求說給我們看一看這種良好的結果時，——他們就反駁我們說：我們怎麼能夠把人的心掏出來呢，那裏自然有良好的結果，這就是——綜合的協調，這就是課程的個別部分的聯繫——它在人的心理中一定應該積累成積極的結果。

這就是說，這裏連在邏輯上都不許用經驗來驗證。因而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循環的理論：方法良好——就應該有良好的結果，而如果有良好的結果，——就是說有良好的方法。

像這樣的錯誤是很多的，這種錯誤是從演繹邏輯的優勢中出發，而不是從經驗邏輯中出發。

所謂道德上的拜物主義，也有很多的錯誤，你們可以看，比方說，勞動的教養。

連我在這一項上也犯了這樣的錯誤。勞動在字義上，是這樣愉快的，在我們看來是這樣神聖的和是這樣正當的，即連勞動的教養，我們都以為是完全沒錯的，固定的和正確的。而以後又覺得，勞動在字義上並不含有某種唯一正確的、完善的邏輯。勞動在最初是被理解為單純的勞動，給自己使用的勞動，以後，勞動又被看做是無目的的、不生產的勞動過程——支出筋肉能力的演習。並且勞動這個字是這樣來說明邏輯，即邏輯是沒有錯誤的，雖然每一步驟都曝露出真正沒錯這件事是沒有的。但人們竟是這樣相信名詞本身上道德的力量，以為連邏輯也是神聖的。然而我的經驗以及我的學校裏的同志們證明了，用名詞本身上的有道德色彩的某種方法來做結論，是不可能的，並證明了應用到教養上的勞動，可以用各種樣式來組成，並在每種個別的情形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無論如何，若沒有同時並行的教育，沒有同時並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教養，則不會得到教養上的好處，而表現出毫無效果的作用。你們叫一個人怎樣勞動都可以，但同時：你們若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去培養他，他若不參加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那麼這種勞動就會起着單純的毫無效果的作用！得不出積極的結果。

成為教養手段的勞動，只有成為整個制度的一部分，才有可能。